

以“八八战略”继续引领浙江共同富裕先行

金祥荣 杨丹萍

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今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未来五年要体系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取得优异成绩。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八八战略”,科学分析了浙江的独特优势和发展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浙江共同富裕先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指明了浙江共同富裕先行的一条内生性发展道路。要继续弘扬和忠实践行“八八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为新征程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更多浙江样本。

一、浙江共同富裕先行与“八八战略”的关系

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一,是形成中等收入阶层在数量上占主体的一种和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2021年,浙江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至50万元(按三口之家计算)群体比例已高达72.4%,明显高于全国水平;“三大差距”主要体现指标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值,浙江为1.94,大大低于全国的2.5。2021年末,浙江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分别达290.4万户和549.2万户,根据常住人口推算,“民营老板率”达每7.8人中一个。这些颇具共同富裕特质的“浙江现象”,离不开“八八战略”的重要指引。

浙江的共同富裕先行取决于其内生先发优势。“八八战略”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和“块状特色产业优势”,这两大优势内生于浙江的人文历史文化,是浙江共同富裕先行的制胜法宝。改革开放之初,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下,浙江大胆尝试,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体现了浙江人独特的、较为普遍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风险偏好态度,也即企业家精神,随后诞生了一系列典型、经验、样本,如闻名于世的“温州模式”,逐渐形成了体制机制优势。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同样源自特定要素在特定的地理空间集聚的历史

条件。这些特定要素包括产业特定性知识、技术工匠和特质劳动力、产业氛围等,它们往往经历一代代人的继承、发展与突破,流传至今;它们的低流动性特征导致这些要素一旦在特定区域内生成,便很难或很少再向四周扩散,经过漫长的内生演化与累积,最终呈现产业的空间集聚状态,引发了块状特色产业的起源与演化,如温州的鞋业、永康的金业、宁波的服装业等。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浙江共有10亿元产值以上的块状特色产业312个,实现销售收入2.81万亿元,出口交货值6122亿元,从业人员831万人,分别占全省总量的54%、62%、56%。而后,浙江又推动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2021年,全省20个“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工业总产值达5706.2亿元,新增固定资产投资1104.7亿元,完成标志性项目投资404.9亿元,充分展现了“八八战略”的重大实施效果。

浙江的共同富裕先行取决于其核心内生机制。在块状特色产业(产业集群)基础上形成的超细密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是浙江共同富裕先行的核心内生机制之一。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垂直专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这种垂直专业化分工主要就是以大中企业为主导的、众多中小微企业参加的外包体系和超细密的配套分工体系,这两大发达的分工体系引发更加专业化的特质劳动力市场、更加邻近的中间产品市场和更加低成本

的供应链体系,这是浙江经济更具创新能力和竞争效率的主要条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细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就是让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参与分享大企业的经济总剩余。

浙江的共同富裕先行取决于其内生营商环境,市场上的企业更偏向于内部分工还是外部分工,这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和营商环境的好坏。“八八战略”强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在市场交易成本无穷大、营商环境极差情形

下,企业会选择更多的内部分工,极端情形下就是打造全价值链和产业链,这时会牺牲外部分工带来的效率。因此,浙江共同富裕先行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越好的营商环境,形成越低的市场交易成本和创业成本,推动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更深更细,从而形成更高的企业效率和社会总剩余或福利,同时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参与分工体系、共享经济总剩余的发展格局。从各个省域营商环境排行榜看,浙江的营商环境在全国一直走在前列。

浙江的共同富裕先行取决于其内生发展路径。“八八战略”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始终贯彻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即强县战略和特色小镇建设,其中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和特色小镇建设等做法在全国试点推广,走出了一条空间上适度均衡的城镇化道路。多年来,在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浙江众多县(市)上榜并名列前茅,县域块状特色产业遍地开花,以县城为载体的三、四级发展点轴也有很好的营商环境,超细密的价值链、产业链分工体系得以延伸至广大乡镇地区,这是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且全国领先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在“八八战略”指引下,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创新完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互促共荣,高质量发展带动高水平的创业就业,城乡、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发展更加均衡,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释放了活力。“八八战略”为浙江实现共同富裕先行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指导,践行“八八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浙江的重要体现,其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习和推广意义。

二、进一步放大“八八战略”优势的相关路径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放大“八八战略”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的独特优势,应进一步推动“八八战略”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体制机制、重点领域相衔接,在缩小城乡发展环境差距、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和深化专业化分工等方面作出重大部署,实现

经济社会更全面、更均衡、更可持续发展。

努力缩小城乡发展环境差距。在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交易条件和效率等方面,浙江还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影响了县域以下地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应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县乡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市场交易网络化、规模化、制度化,改善市场交易条件和效率;加大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领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山区、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基层政府办事效率,建设服务型政府,努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专精特新企业的提质扩量是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深化和细化的主要内容。浙江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数量和质量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多数企业还存在范围不经济,研发投入停留在较低水平,企业被终端或上下游企业“卡脖子”,市场地位不高、谈判能力弱等突出问题。要从行业实际情况出发,鼓励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进企业转型升级;针对专精特新企业产品大多品种规格众多、精密或复杂度高的技术特点,做强做优做大企业范围经济;优化产业组织,重点支持培育具有较高市场地位和谈判能力的行业龙头产业链供应商。

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实体经济。要充分发挥浙江以制造业为重点的民营实体经济优势,慎防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块状特色产业集群式转移和集群式衰退问题进行精准诊断,大力支持行业龙头企业沿着高端价值链率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建立起现代化产业体系。

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浙江众多的专业市场和发达的互联网平台经济所形成的“线上+线下”公共营销网络,大大降低了产品的信息搜索成本,降低了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市场成本,降低了其高质量创业和参与分配的门槛。应精准制定支持政策,建立专业化服务机制,鼓励平台企业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中大显身手。

【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院长,常务副院长】

之江青年论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随着内外部条件的深刻变化,采用新型举国体制进行核心技术攻关成为我国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法宝。

近年来,浙江创新生态进一步优化,重大创新平台加速集聚,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5位,“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取得较大进展。接下来须聚焦“四个面向”,以更高的系统性组织能力和创新范式,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探索以新型举国体制进行核心攻关技术的浙江路径。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高效组织体系。科技管理部门作为具体落实新型举国体制职责的协调办事机构,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增强识别核心关键问题的能力,强化推进跨部门跨区域跨业务的联动,以数字化改革建设“创新大脑”,加强科技决策引导、绩效评价、风险防范,提高科技管理集中统筹能力。同时,引入我省国家战略科研力量、创新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设立专家评估委员会,结合我省三大科创高地建设要求和“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清单”“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清单”“进口替代清单”“成果转化清单”等,衔接国家重大专项,精准锚定须采用新型举国体制攻关的关键核心技术。

培养“链主”企业推动协同攻关。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培育具有治理能力和地位的“链主”企业,出台产业链定制扶持政策,制定“链主”企业认定标准。建立产业链“链长制”,实施“强链、补链、延链”全链条工程,支持中小企业做专做精,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练就独门绝技,在产业链创新链的重要节点上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促进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推动“链主”企业发挥主力军引领性作用,带动职业技能人才(浙江工匠)培养。

集聚创新要素提升攻关能力。从人才梯队来看,要多措并举引培科技领军人才。精选、引进一批具有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战略科学家,担纲专设机构技术领头羊。有计划地锻炼培养更多有战略思维、跨学科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力的复合型青年人才。从资金投入来看,要多渠道增加重大攻关专项投入。整合发挥政府产业基金效能,探索建立与重大攻关研究运行相适应的长期投入预算制度,设立重大攻关专项经费。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金。从创新平台来看,要系统谋划科学中心建设。强化省市区联动机制,多方联手、推进立项,抓紧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重攻关制度推进成果落地。设置重大攻关专项分类指导和考核评价制度,以分阶段考核结果来实现经费分段投入,督促攻关工作有效运转。对产业前瞻性、基础性技术,可采取小同行和国际性评价,科学合理安排考核时间期限;对共性关键技术、产品和技术成果应采用市场或关键用户评价方式。强化政策法规引领,及时总结我省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方面的经验成果,加强财税政策、人才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金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之间的系统集成,出台指导性意见。对参与重大攻关专项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政府采购、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差异化配置政策。促进成果转化,运用区块链去中心化、不可修改等手段形成技术证书,建立成果可溯源制度,清晰成果合作界限。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培育专业化、复合型中介机构。注重重大攻关专项形成标准化研究成果,抢占国际标准化先机,推进科技创新与标准创新互融互促。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层调研

从“六个维度”打造品质文化之城

镇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认真抓好落实,结合镇海实际,持续擦亮区域海丝文化、海防文化、商帮文化、红色文化、科创文化等“五张名片”,努力打造品质文化之城,为奋力推进“两个先行”镇海实践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以文铸魂,打造思想理论新高地。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做大做强“理享+”“信息到家”等宣讲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坚持加强理论武装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挖掘革命老区资源,传承红色文化,让红色基因深植基层、代代相传。加强理论传播体系建设,进一步建强“镇灵通APP”等宣传矩阵,增强创新理论传播效果,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以文塑韵,展现品质之城新形象。坚持系统超前谋划,突出现代眼光,深入挖掘镇海的自然禀赋和历史人文风情,让文化因子渗透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试点为契机,厘清重要文化遗存、重大文化项目与城乡空间的关系,科学安排文化功能片区,整体布局重大文化项目。将“海天雄镇、科创镇海”城市口号深度融入城市整体建设规划,打造一系列形象标识产品,不断提升镇海的辨识度。

以文溯源,激发历史文脉新活力。打造涵盖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文化产业等门类的文化名片体系。加强鱼山、乌龟山、应家等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做好活化利用文章,谋划建设遗址公园,推动历史文化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加强文物保护,对现存的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绍兴实践

程 晟 沈费伟 黄 刚

实践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近年来,绍兴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以促进社会团结为导向,持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综合运用法治思维、技术治理方式,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的有机统一。

一、绍兴“六要素两平台四机制”的创新实践

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织密基层社会平安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增强基层治理“一中心四平台两格”功能。绍兴创新推出“六要素两平台四机制”举措,发动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等各方主体参与共建共治共享。

健全完善制度、组织、队伍、业务、教育、保障“六要素”内容,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一是以专项行动方案等制度创新,完善顶层设计。2018年,绍兴出台全省首个《人民调解化解信访案件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了矛盾纠纷的工作内容。二是以行专调委办、功能区调解等组织创新,完善组织样态。2021年,绍兴在25大行业、专业领域建立了87个调委会,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涉拘留所调解组织建设实现全市全覆盖。三是以人民调解员孵化、行专调解员聘用等队伍建设,补足人员力量。通过人民调解协会等组织聘任,政府出资购买调解服务等形式,推进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四是以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等业务综合协调,完善联办方式。市司法

局与市中院、市检察院横向协同,市县乡三级“访调对接”实体平台纵向联动,行政系统内外资源综合协调,共同化解矛盾纠纷。五是以法治文化营造、法治阵地建设等法治宣传行动,完善普法教育。出台《关于构建社会大普法格局的实施意见》,制定《普法依法治理年度工作要点》,推进“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等。六是以经费保障、激励机制、考核监督等支持性举措,完善基础保障。将专职调解员聘用、政府购买调解服务、调解员培训、“以案代补”等调解工作经费分别列入县、镇两级财政预算。

创新构建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解的空间联办平台与网络共治平台,形成全时空、零距离、全内容、全链条网络。一是以“枫桥式”司法所、三级矛调中心等空间载体,完善联办平台。创新“枫桥式”司法所标准体系、制度体系、保障体系,强化过程监督指导和复评退出机制,打造家家都有“法律明白人”、事事都有“专业调解人”、村村都有“服务贴心人”、个个都有“结对帮扶人”的“四有模式”,形成县级“终点站”、镇级“主阵地”、村级“前哨所”三级三类矛调中心服务体系。二是以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浙江解纷码”等网络载体,完善共治平台。持续推进“浙江解纷码”“省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协同”应用系统建设,充分利用协同系统的面对面接待流转基础和线上调解资源,构建线上线下一体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体系。

重点实施“行专调解、预防引调、联动协同、网络随调”四大调解机制,助力市域社会治理过程性难题的有效化解。一是采用“平台+人才”的行专调解方式。统筹推进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进驻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推行“点单”调解、“专家坐诊”、团队“会诊”模式。2021年,绍兴

全市各类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19471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50%以上,调解成功率19299起。二是采用“预防+引调”分类化解方式。构建“行业牵头、调解为主、示范判决”的解纷工作新格局,有效预防和化解重点行业突出问题。如设立中国轻纺城市市场巡回调解室,就地引调轻纺城市市场的花样版权纠纷,开启花样版权“简易维权”绿色通道。三是采用“联动+组团”调解纠纷方式。综合吸纳各行业领域专家,创新培育区域调解品牌,组建综合调解团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如“江大姐”调解工作室、“尚明调解室”等。四是采用“线上+线下”便捷调解方式。借助网络调解平台,实现矛盾纠纷化解“网上随时办、全域就近办、简易快捷办”。

二、绍兴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基层治理的经验启示

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及时总结、归纳、推广绍兴在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工作上的有益经验,对于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党建统领,增强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目标性。以党委政法委牵头,政法各单位为主体,调动其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形成各方参与、多元共治综合工作格局。同时,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矛盾纠纷依靠人民解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整体智治,提升矛盾纠纷多元

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系统性。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推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民众个人和市场机构等多元主体对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实现党委、政府、司法、监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精准、高效回应人民群众需求。

坚持服务多元,凸显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参与性。推动治理目标从化解纠纷问题向增进人民福祉转变。强化服务导向和多元化导向,允许相对灵活地采用社会化、市场化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矛盾调解主体既可以是行政人员、法官、公安,也可以是第三方调解机构。

坚持预防化解,强调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识别性。强调源头预防与及时化解。源头预防既包括落实分析研判机制,健全矛盾纠纷定期排查预警反馈机制,还包括普法宣传和法治教育的实施。及时化解就是及时响应、传导、反馈,解决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是“先行官”,及时化解是“后勤兵”,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促成。

坚持“枫桥式”,增进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内部性。强调人民主体、实现人民的利益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绍兴的创新实践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共建共享,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坚持“一站式”,保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解综合机制便捷性。以“一站式”集成服务为发展要求,通过搭建社会治理领域综合性服务平台,打造更多联系群众的沟通桥梁和便捷、高效、经济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快速通道”。

【作者分别为杭州市绩效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